

匡亚明 主编

高晨阳 著

中 国 思 想 家 评 传 从

阮籍评传

书



南京大学出版社

Critical Biography Series of Chinese Thinkers

A CRITICAL BIOGRAPHY OF
RUAN JI

Gao Chenya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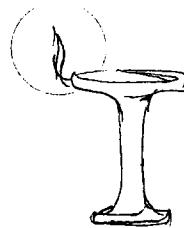
Nanjing University Press

ISBN 978-7-305-05952-0

A standard linear barcode representing the ISBN 978-7-305-05952-0.

9 787305 059520 >

定价：50.00元



匡亚明 主编 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

阮籍评传

高晨阳 著

南京大学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

南京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阮籍评传/高晨阳著.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1. 4

(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匡亚明主编)

ISBN 978 - 7 - 305 - 05952 - 0

I. 阮… II. 高… III. 阮籍(210 ~ 263)—评传
IV. B235. 9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67189 号

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

(典藏版)

阮籍评传

高晨阳 著

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

(南京大学校内 邮政编码:210093)

安徽省儒林图书有限公司 发行

网址:www. rulin. com. cn

三河市华新科达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印刷

开本 660 × 960 1/16 印张 25. 25 字数 284 千

2011 年 4 月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305 - 05952 - 0

定价:50. 00 元

《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序

匡 亚 明

伟大的中华民族在长达五千年连绵不断的曲折发展过程中,像滚滚东流的长江那样,以磅礴之势,冲破了重重险阻,奔腾向前,现在更以崭新面貌,雄姿英发,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奇迹。产生这一奇迹有诸多原因,其中十分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勤劳、勇敢、智慧的各族人民,在长期的生产活动、社会活动、思维活动和对外交往以及抗击外来侵略过程中,逐渐创造、积累、发展了具有以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为核心的优秀传统思想文化。这是一种伟大、坚强的精神支柱,是我们民族凝聚力和生命力之所在,是历史留给我们所有海内外炎黄子孙引以自豪的无价之宝。

当然,和各国各种不同传统思想文化一样,在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传统中,也是既有精华,又有糟粕,因而全盘肯定或

全盘否定，不对；一知半解、信口开河或裹足不前、漠然置之，也不对。郑重而严肃的态度应该是对它进行实事求是的科学的研究和分析，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继承和弘扬这份瑰宝，振兴中华，造福人类。人类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就是在不断去粗取精、继往开来和改革创新过程中实现的。继往是为了开来，开来不能离开继往。民族虚无主义和复古主义，都是违背历史发展的辩证规律的。

现在我们国家正处在一个新的继往开来迈向四化的关键时刻。继往就是继民族优秀传统之往，开来就是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来。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从广度和深度上进行系统研究，实现去粗取精的要求，正是继往开来必须完成的紧迫任务。我认为这是中国各族人民，首先是文化界、学术界、理论界义不容辞的光荣职责。但面对这一时间上长达五千年，内容上涉及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等各个领域的传统思想文化，将从何着手呢？毛泽东同志早在1938年就说过：“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①这是很有远见而又切合实际的英明建议。从孔子到孙中山这两千余年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文化最丰富的时期，如果总结了这段历史，也就基本上总结了五千年传统思想文化的主要内容。当然，基本上不等于全部。孔子以前和孙中山以后的情况，可以另行研究。因此，我认为首先最好是在时间上从孔子开始到孙中山为止，方法上采取《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的形式作为实现这一任务的开端。这就是从这段历史的各个时期、各个领域和

^① 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522页。



各个学科(包括文、史、哲、经、教、农、工、医、政治等等)有杰出成就的人物中,遴选二百余人为传主(一般为一人一传,少数为二人或二人以上合传),通过对每个传主的评述,从各个侧面展现那些在不同时期、不同领域中有代表性人物的思想活力和业绩,从而以微见著、由具体到一般地勾勒出这段历史中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总体面貌,揭示其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的主要内涵,以利于开门见山、引人入胜地批判继承、古为今用,也为进一步全面系统地总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打下基础。自从毛泽东同志提出上引建议后,半个世纪以来,不少专家学者已从各个方面做了许多工作,但对全面完成这个任务来说还远远不够,还要在深度和广度上继续努力。作为“抛砖引玉”,本《丛书》只是这个继续努力所应完成的工作的一部分。《丛书》凡二百部,约四千万言,自1990年开始陆续出版,争取十到十五年全部出齐。

《丛书》所以用“中国思想家评传”命名,主要是考虑到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核心是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而历史事实也反复证明,凡是在各个不同时代不同领域和学科中取得成就者,大多是那些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自觉或不自觉地认识和掌握了该领域事物发展规律的具有敏锐思想的人。他们取得成就的大小,取决于思想上认识和反映这些规律的程度如何。思想并非先验之物,它所以能反映和掌握这些规律,主要是通过社会实践和对前人思想成果的借鉴和继承。思想一旦形成,反过来在一定程度上又对实践起决定性指导作用。韩愈说的“行成于思,毁于随”^①,列宁说的“没有革命的理论

^① 韩愈:《进学解》,中华书局《四部备要》东雅堂本《韩昌黎全集》卷一二,第3页。



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①，这些话，虽所处时代和所持立场不同，所要解决的问题的性质也不同，但就认识论中思与行、理论（思想的高度概括）与实践的关系而言，确有相通之处，即都强调思想对实践的指导意义和作用。因此我们以“中国思想家评传”命名，就是力图抓住问题的核心，高屋建瓴地从思想角度去评述历史人物，以便对每个传主在他所处时代的具体情况下，如何在他所从事的领域中，克服困难，施展才华，取得成功，做出贡献，从思想深处洞察其底蕴。历史上各个时代富有思想因而能在有关方面取得成就的人，直接阐述自己思想观点的论著虽亦不少，但大量的则是其思想既来自实践（包括对前人、他人实践经验的吸取）、又渗透在自己创造性实践之中，集中凝聚在他自己的业绩和事功上，而没有留下论著。另一些人却只留下著作而无其他功绩，对这些人来说，他那些有价值的著作就理所当然地是他的伟大业绩和事功。如果论述一个人的思想而不联系他的业绩（包括著作），必将流于空洞的抽象；同样，如果只讲一个人的具体业绩而不结合他的思想活动，又必将成为现象的罗列。评价思想和评价业绩，两者不应偏废。而不断在实践中丰富和深化的思想活力则是经常起主导作用的因素，强调这个因素，引起人们的正视和反思，正是我们的主旨和目的。当然，思想和思想家，思想家和实践家，都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不同概念，忽视这一点是不对的。《丛书》的重点则是放在两者的联系和结合上。至于如何使两者很好联系和结合而又着意于剖析其思想活力，各占多少篇幅或以何种方式表达，则自当由作者根据传主的具体情况创造性

① 列宁：《怎么办》，《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241页。



地作出妥善安排。

自从人类历史上产生了马克思主义,不仅全人类解放和发展有了划时代的明确方向,学术研究也有了更严密的科学方法,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根据这一科学方法,在研究和总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特别是联系到《丛书》的撰著时,我认为下列几点应特别引起重视。

一、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实事求是是贯穿在马克思实际活动和理论研究中的主线,离开了它也就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只有切实掌握了客观情况,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和判断。前者为“实事”,后者为“求是”,二者相结合,就叫实事求是。事不实则非夸即诬。为了弄清情况,就必须对情况的本质与现象、整体与局部、真与伪、精与粗,作出区别、梳理和取舍,这样才能掌握情况的实质,达到“实事”的要求;然后进一步加以分析研究,找出事物本身固有的真相而非主观臆测的假象,并验证其是否符合人民利益和人类历史前进方向,是否反映科学、技术、文化、艺术的发展规律,这样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和判断,达到“求是”的要求。实事求是是治学的基本功夫,是对每个传主的功、过、是、非作出公正评价的必要前提。不论古今中外,对历史人物过高或过低的不公正评价,大都由于未能认真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的缘故。

二、坚持批判继承的原则。马克思主义学说就是批判的学说,而批判是为了继承、发展和创新。这就需要我们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既要继承发扬传主业绩和思想中的积极因素,又要批判清除其消极因素。凡传主业绩和思想中体现了诸如爱国主义、民主意识、科学见解、艺术创造和艰苦奋斗、克己奉公、追求真理的精神,即在符合历史前进要求的“立德”、“立



功”、“立言”诸方面有显著成就等积极因素者，必须满腔热情地加以继承和弘扬，并紧密结合当前社会主义建设实际，使之深入人心，蔚然成风；凡反映有诸如封建迷信、专制独裁、愚昧落后、丧失民族尊严和违背科学进步等消极因素者，必须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加以批判，清除其一定程度上至今尚起作用的消极影响，而消极因素经过彻底批判后可转化为有益的教训；凡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相混者，更当加以认真清理和扬弃，既发扬其积极因素又摒弃其消极因素。我们力求一点一滴、切实认真地探索各个传主思想和业绩中珍贵的积极因素，使之成为全国各族人民正在从事的继往开来伟大历史工程的组成部分。

三、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是发扬学术民主、促进学术繁荣的正确原则和巨大动力。前者强调一个“齐”字，后者强调一个“争”字，是表示学术上平等、民主和自由的两种不同状态；前者突出的是统一与和谐，后者突出的是区别与争论；两种状态又统一于不断地相互促进和相互补充、转化的持续发展提高过程之中。“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体现在撰著评传时，应从“齐放”和“争鸣”出发，综合中外各个时期对有关传主的不同评价，吸取符合客观存在的对的东西，摒弃其违反客观存在的不实的东西，然后创造性地提出经过自己独立思考的、赶前人或超前人的一家之言。同时，对整个《丛书》而言，也有个共性、个性又统一又区别的问题。这就是一方面作者应把“实事求是”、“批判继承”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几点作为大家的共性（统一与共识）；另一方面，对每部评传的立意、结构和行文（文体、文风和文采等），则主要是作者的创造性思维劳动和雅俗共赏



的文字表达艺术的成果,是彼此的个性(区别),不宜也不应强求一律。评传作者都有充分自由去发扬这一个性,力求在对每一传主的评述中探索和展示其积极因素,使之和正在变革中国面貌的伟大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融为一体,丰富其内容,促进其发展,而不是仅仅停留在对传主思想业绩的一般性诠释上。

我认为,以上三点大体上可以表达《丛书》所遵循的主要指导思想,但也不排除用其他思想和方法得出的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感谢所有关心和支持《丛书》工作的单位和个人,特别感谢《丛书》的名誉顾问和学术顾问。他们的热情关心、支持和指教,使《丛书》工作得以顺利进行。更要感谢所有承担评传撰著任务的老中青学者,他们都以严谨的治学态度,作出了或正在作出对学术,对民族,对历史负责的研究成果。没有他们的积极合作,《丛书》工作的开展是不可能的。《丛书》副主编和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南京大学出版社,在制定《丛书》规划,约请和联系国内外学者,审定书稿以及筹划编辑出版等方面,克服重重困难,做了大量工作,他们的辛勤劳动是《丛书》能按预定计划出版的必要前提。

现在《丛书》开始出版了,我作为年逾八旬的老人,看到自己迫于使命感而酝酿已久的设想终于在大家支持合作下实现,心情怡然振奋,好像回到了青年时代一样,体会到“不知老之将至”的愉悦,并以这种愉悦心情等待着《丛书》最后一部的问世;特别盼望看到它在继承中华民族传统思想文化的珍贵遗产方面,在激励人心、提高民族自尊心和爱国主义思想方面,在促进当前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继往开来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历史性伟大事业中,能起到应有的



作用。我以一颗耄耋童心，默默地祝愿这一由一批老中青优秀学者经长年累月紧张思维劳动而作出的集体性学术成果能发出无私的熠熠之光，紧紧伴照着全民族、全人类排除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障碍，走向和平、发展、繁荣、幸福的明天！

热诚欢迎国内外同仁和各界人士不吝赐教，以匡不逮。是为序。



序 言

魏晋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著名乱世，民族分裂，战火连绵，政局动荡，再加之天灾盛行，现实充满着苦难。生活在那个时代的每一个人，都承受着巨大的痛苦。其中，知识分子阶层的痛苦较之其他阶层的人似乎更为沉重，因为他们所感受到的痛苦不止是在肉体上，而且更重要的还在心灵上。知识分子从来就是一个善于编造理想的社会阶层，他们习惯于以自己的理想去影响、改造现实。然而，历史和社会并不会按照他们的主观愿望前进。如果说在“太平盛世”，理想与现实尚有几分弥合的话，那么在乱世，理想与现实的距离则会急剧地扩大，以至于形成尖锐的对立。魏晋之世就是这样一个时代。由于知识分子的理想受到现实的压迫，理想实现的途径受阻，甚或失去了任何可能性。他们的身心不免处于一种极度压抑、焦虑、徬徨之中，这是知识分子阶层所特有的一种忧患之感。从内容上，它既包括对社会现状的考虑，又包括对个体安身立命之地的思索，映现到哲学思想的高度，便构成了自然与名教之辨这一特定的时代主题。本质上说，魏晋玄学士人的自然与名教之辨，都是旨在回答与解决理想与现实的关系和矛盾问题。但是，他们有的侧重在社会整体的层面上，试图以理想矫正现

实,使社会的秩序复归于和谐;有的则侧重在个体的层面上,以理想批判现实,试图在超现实的世界彼岸去寻求自己的理想,实现自我精神的自由,从而表现为某种思想倾向或理论形态的差别。

阮籍是玄学人士中一个极富有鲜明个性的人物。无疑,他的理论兴趣确实在自然与名教之辨上,但问题又似乎并不如此简单。阮籍不单是表现为对社会政治的关注,而且也表现为对个体精神自由的关注。他的自然与名教之辨,不单是体现在理论层面上,而且也体现在行为实践上,表现为一种旷达纵放的生活情趣或生活方式。阮籍其人及其思想较之其他一些玄学士人更为复杂。

如何正确地理解和把握阮籍其人及其思想的特质,复制出他的历史真貌,客观地再现阮籍所反映的时代精神呢?用不着说,阮籍所处的时代早就成为历史,阮籍其人也早就成为历史人物,今人已经无法亲闻其声,亲睹其面,亲观其行。尽管历史留下了一些有关他的资料,但这些资料仅是一些残缺不全的死物,它自己并不会主动地说话。今人所做的工作恰恰就是要恢复他的历史真貌,使这个已经逝去的古人复活,以一种活灵活现、有血有肉之躯重现于我们的面前。这是任何一个历史工作者所无法避开的矛盾,也是他所必须解决的矛盾。我们要做好这项工作,无疑应该忠于历史,以尽可能丰富的完备的历史资料为依据。这是研究历史的前提或先决条件。然而,仅仅做到这一步还远远不够,还必须注意研究方法。我这里所说的方法,特指某种观念或视角。历史是死的,对于某一特定的历史对象来说,有关资料也往往是死的。但是,历史研究从来没有停滞在一个水平上,从发展趋势看,后来者往往居上,学术



领域有日新月异的变化。这原因不是别的，就在于方法的进步、观念的更新、视角的转换。我们上面所说的可能是老生常谈，但对于笔者来说，在研究阮籍时却应该自觉地奉为圭臬。

基于此，我想就本书所选取的视角或分析问题的方法予以重点说明。这个方法，在内容上也就是把阮籍其人及其思想当作一个复杂的整体，从多层次、多角度、多方面入手，再现或复原历史的真貌。当我们从“纵向”的视角契入阮籍思想这一特定对象时，首先进入视界的是一个动态的演变着的理论体系。阮籍思想芜杂，儒道互陈，但这种思想上的矛盾现象并不全是阮籍自己的疏忽或理论上的漏洞，而是说明其思想经历了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大体上说，阮籍早期崇尚儒学，中期倾向于儒道综合，强调自然与名教的统一，试图为曹魏政权由名法之治复归于名教之治设计一个合理的政治方案，在人们面前展现出来的是一个“天人合一”的理想的客观世界。可是在典午之际，司马氏集团和曹氏集团展开了殊死的权力之争，大批名士被卷入政治漩涡而走上了断头台。特别是司马氏打着以孝治天下的幌子谋夺曹魏政权，名教的尊严受到亵渎而成为一个毫无内容的虚伪可憎之物。阮籍的理想破灭了，与此相应，他被迫选择了自然与名教对立的立场，把理论目光转向自我意识自身，在主观意识领域设计了一个理想的精神自由的世界。

然而，阮籍的思想演变，只是理论表层或理论兴趣的转向，而不是意识深层的观念转换，其早期儒家式的理想与信念业已形成一种根深蒂固的“情结”，牢牢地潜藏在他的心理底层。因此，如果我们把阮籍后期的思想再在“横向”上切下一刀，剥离掉玄学理论的表层形式，在其精神世界无比逍遥与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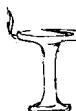
由的外衣下,可以发现一个极端苦闷、彷徨、痛苦、焦虑的灵魂或情感世界。

阮籍并不止是一个专务玄言清谈的理论家,他更为著称于世的是那种旷达纵放的生活情趣或行为方式,所谓名士风度,而名士风度乃是其早期的理想和价值目标实现途径受阻而产生的激愤之物。由于理想与现实的严重分裂和对立,他不得不调整自己的行为方式以适应环境和平衡自己的心理,从而表征为内在理想与外在自我形象相分裂的双重人格特征。

这就是阮籍,这就是历史上阮籍的真实面貌。历史决定着逻辑,或者说决定着我们把握它的特定方式。显然,我们认识历史所采用的是横向与纵向,表与里、动与静相结合的方式。这一方式,可以称之为是一种“网络”性的方法,它可能更符合列宁所说的“辩证法是活生生的多方面的(方面的数目永远增加着的)认识”^①的基本原则。

以上所说,当然只是笔者的主观设想,至于能否达到预期目的,那又是另外一回事了。自知才力与学识有限,在写作过程中,深感力不从心,笔难达意,况且笔者所见也难免偏颇、谬误。因此,本书毕稿,心里颇有些惶恐。但也只能不揣愚陋,斗胆把拙见公诸于世,去接受大家的批评了。

① 见《谈谈辩证法问题》,《哲学笔记》,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411页。



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

名誉顾问 陆定一 谷 牧 李铁映 陈焕友

《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工作领导小组

组 长 王霞林

组 员 韩星臣 王 湛 石启忠 张永桃
冯致光

学术顾问 (按姓氏笔画为序)

丁莹如	丁光训	王元化	王朝闻
冯友兰	曲钦岳	任继愈	刘导生
刘海粟	安子介	孙家正	
杜维明(美国)		杨向奎	苏步青
李 倪	吴 泽	何东昌	张岱年
陈 沂	罗竹风	赵朴初	施觉怀
钱临照	徐福基	袁相碗	
席 文(美国)		唐敖庆	黄辛白
蒋迪安	程千帆	谭其骧	滕 藤
戴安邦	魏荣爵		

主 编 匡亚明

终审小组 茅家琦 周勋初 潘德宏

副 主 编 (按姓氏笔画为序)

卞孝萱	巩本栋	时惠荣	张永桃
陈 振	茅家琦	林德宏	周勋初
洪修平	蒋广学(常务)		潘富恩